

中國地方教會正在浮現？

韓德力

(編者按：本文是韓德力神父去年春
向一班歐洲天主教徒發表的演講。)

引言：鑑古知今

報導今日中國天主教的情況，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亦是最複雜論題之一，因為這要考慮到所有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宗教、神學各方面的問題，亦要給予每方面的因素公允的評價，否則便會導致整個論點出現偏差。

然而情勢的轉變是如此迅速，我們實在急需有關中國教會的資料，以供參考。須知，目前的演變不論對教會或是對中國，都是歷史性時刻，足以與十六、七世紀利瑪竇及其同伴的時代相媲美。如果我們不明瞭現在局勢的歷史性意義，我們可能會使中國教會，也使普世教會失去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天主召喚我們與中國地方教會一起努力，去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我們預備接受此項挑戰嗎？我們該採取何種模式？這種模式與

過去的方式有何不同？我們有否意識到，我們所親眼見到的中國天主教會艱苦奮鬥的這一刻，可能就是真正中國地方教會萌芽的歷史性時刻？

在這篇文章裏，我欲提供一些個人訪問大陸的心得，以及我們與許多訪問過西方的中國人交談後的內容。由於近年來的發展，我認爲我們可以對未來的中國教會抱很樂觀的態度；雖然很樂觀，却非過於天真。此一樂觀態度乃緣自許多方興未艾的發展，也由於從四百年演進的背景上去認識中國天主教的情勢。過往悠長歷史中所出現的不少問題，均非如此簡單，有待探究澄清。因此，我們絕不可天真地以爲現在就可以清楚界定一切事情。

任何人欲明瞭今日的中國教會，都必須先回顧教會史中所發生的事情。除非一個人知道禮儀之爭的前因後果，也明白十九世紀天主教仗恃不平等條約得以重入中國所產生

的影响，否則便無法明瞭毛澤東解放後的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一)中國教會史的前五個階段： 從接納到排斥再至強硬進入

第一階段：唐代景教

早在六三五年，波斯主教阿羅本已把基督信仰傳入中國。須知，它不是由歐洲，而是由中亞細亞傳入；它不是由歐洲人，而是由中亞細亞人傳來中國。

那時，基督信仰在中國大約十個省傳播開來。有百餘個村鎮建立了教堂。公元六三五年至八四五年間，景教徒將三十餘卷聖經譯成中文。

公元八四五年，適值唐武宗排除佛教，儘管基督教當時並非被迫害的直接對象，却同時受到誅連，使「中國地方教會」無法得以留存。

第二階段：元朝方濟會士

自中亞細亞人試圖將基督信仰傳入中國後，歐洲人也試圖如此做。公元一二九四年，孟高維諾到達北京，並在那裏建立了兩所教堂，把新約及聖詠翻譯成蒙古文。

隨着元代的沒落，方濟會士所建的教堂也告消失。雖然仍有基督徒存在，却没有留下有組織性的「中國地方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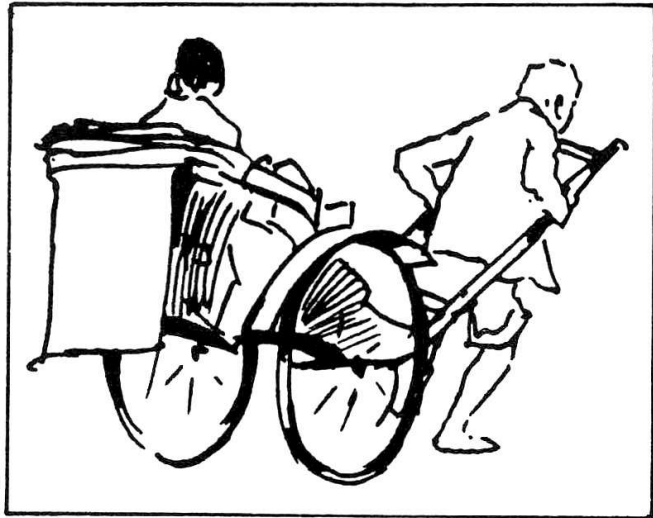
第三階段：明末清初利瑪竇及其他耶穌會士

教會史的第三個階段，即第三度使教會植根中國的試圖，始於十六世紀末羅明堅、利瑪竇及其耶穌會伙伴，這段時期可以稱為中國天主教史的高峰。耶穌會士很能接受中國的文明與習俗，可說是將基督信仰融合於非歐洲文化的先驅。他們大胆地汲取儒家傳統與中國文化，使之與基督福音融合起來。他們不只熱衷傳教，也真的成是東西文化的橋樑，把西方的科學帶入中國，將中國的哲學帶進歐洲，促進東西方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雖然有些中國官員一直懷疑基督福音的內涵，也懷疑基督宗教與外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但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却接受了福音，皈依教會，徐光啓即是一例。康熙皇帝於一六九二年頒佈詔書，承認基督宗教是為一種良好的宗教，允許在中國傳播。當時，基督宗教首次受到最正式、最具權威性的認可。

然而好景不常；雖然當時有些富遠見而開明的傳教士準備推行本地化工作，其他人却不以為然。不久，整個教會對於把福音融合到非歐洲文化的看法上，便顯出尚不夠開放。（如果那時教會採取一種更加容納的態度，現時的教會情勢可能改觀。）對敬孔祭祖禮儀的意見分歧，一直吵到羅馬教廷；一個修會內的歧見，擴散為各修會間的爭端，同時也傳回中國，終於導致所謂的「禮儀之爭」，使中國與羅馬之間的公函與公使來往頻繁。

教宗派大使多羅宗主教與嘉樂宗主教介入調停，使康熙皇帝大為不悅。康熙憤怒地



頒佈了禁教諭令（公元一七二〇）。教宗本篤十四世則禁止敬孔儀式（參閱一七四二年的「自上主聖意」通諭）。於是漫長的教難接踵而至，教會由其顛峰時期跌入被迫害的深淵，達五十年之久。

這首次苦痛的爭端使教會烙上「西方洋教」、「離經叛道」的污名。從那時起，歸化入教被視為對中國不友好，對祖宗不孝，對國家不忠。

教會一貫非常尊重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尊敬先人、維繫家庭和孝順父母的重要性。教會亦在教育、家庭生活和道德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這一次在關係上的破裂，令人遺憾。禮儀之爭發生後，教會在這些事業所起的積極作用，常被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所忽視，還蒙上「外國的」、「洋教的」、「不愛國的」招牌。當今中國的情形，證明這些傷痕仍舊存在。

第四階段：清代教會遇到的排斥

康熙皇帝撤銷了他的「容忍詔書」後，迫害宗教隨即興起，但天主教並未滅絕。雖

然有些外籍傳教士仍留在中國，但教會已明顯不受歡迎，教會得以繼續生存主要是靠本地中國神職人員的努力。在中國教會史上，這是一段英勇時期。對於那段時期的了解，人們亦知之不詳。

在這段時期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有待解答，就是：難道當時沒有合適的中國人可以繼承第一位中國主教羅文藻嗎？假如當日能指定一位中國主教繼承，豈非可使中國地方教會萌芽？然而直至一九二六年教會才委出第一批中國主教，這顯示教會及其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尚未盡全力促成地方教會的成長，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

第五階段：教會在不平等條約下的再度進入

以服務中國現代化進行傳教

基督宗教隨鴉片戰爭第五度進入中國（這並非新的進入，因為實際上教會未曾滅絕）。由於有大量外籍教士到來傳播福音，造成皈依人數顯著的增加，使中國天主教徒在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由數十萬增加到三百萬。

傳教士和修會團體抓緊這個機會，認為這是天主恩賜的大好時機，遂懷着傳統的傳教熱火，到來宣講福音，也響應國內社會的需求，投身社會服務的工作。

在那時期內，天主教在中國建立了三所大學，一百九十所中學，近兩千所小學，二百五十所育嬰院，二百二十所醫院，與七百八十間診所，亦從事農業發展計劃，試圖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

客觀地說，這些措施對十九世紀中國的進步與現代化功不可沒。然而，一般中國人并不這樣看，因為開設學校醫院等的權利，是教會從不平等條約中得來的，被視作強權。

我們必須承認，本篤十四世的「自上主聖意」（至一九三九年才由庇護十二世撤銷）也留下了深深的創痕。傳教士們沒有注意福音與文化的結合。況且，雖然中國神父已由本地的大小修院陶成，但掌權的主教職位仍落在外國人手中。

「洋教」污名再被証實

在西方天主教徒的眼中，傳教士因其勇敢、犧牲精神與虔誠信仰，備受讚揚，中國教友也欽佩愛戴他們。然而，一般中國大眾却不這樣看。儘管傳教士富於獻身精神，他們仍被視為與所有「洋鬼子」同類。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詛咒這些「洋鬼子」以不平等條約侮辱劫奪了他們的國家。因着這些條約的保護，傳教士得允再入中國。即使傳教士本身不會「強行」返回，但在中國人眼中，並沒有太大區別，因為他們認為一切基督教會都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工具

。難道傳教士們不是受外交使團保護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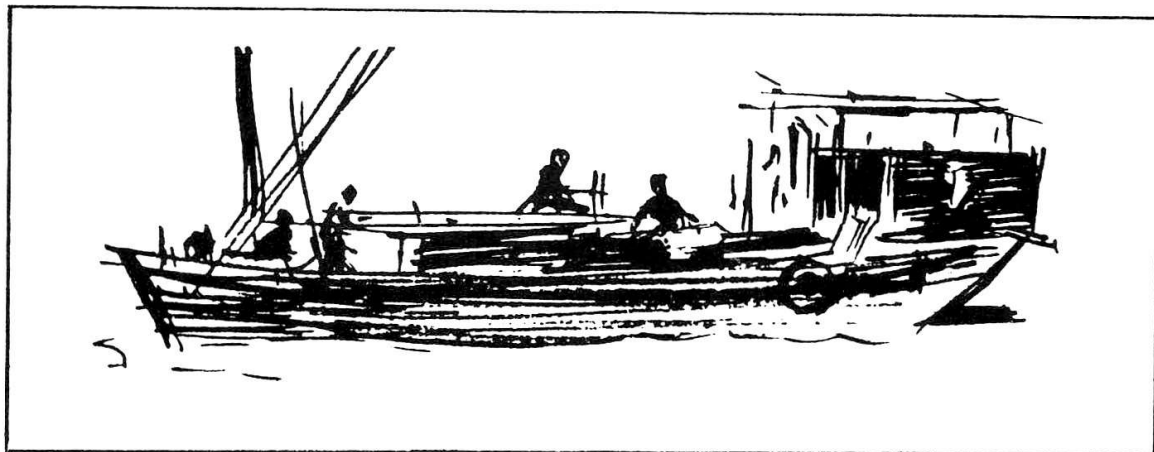
不僅如此，連新領洗的天主教友也享有特權，受外國領事館保護。因此，一般說來，他們被視為不愛國的中國人，被中國社會蔑視，許多的教案及糾紛亦由此產生。

教會在教育、衛生與農業方面的貢獻，只受當地少數居民的讚賞，因為傳教士利用了外國領事館及其砲艇的保護，而對於他們的積極貢獻，社會一般不願多提。在很多中國人眼中，與傳教相關聯的殖民主義扼殺了福音訊息。

反外情緒與反教情緒

當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興起時，反外情緒與反教情緒成為同義詞。中國人對「洋鬼子」的仇恨在基督教傳教士身上發洩出來；教堂被焚毀，神父、會士及中國教友被殺，還有些在教堂內被焚至死。

有些著名的西式天主教堂已成為反外鬥爭的紀念碑。今天經過這些教堂的中國人，都會憶起這些天主堂的洋教史蹟，例如：天津的望海樓教堂與北京的北堂。外交官與天主教徒曾躲藏在這些教堂裏，而天津教友至今仍談論望海樓教堂被焚時教友殉道的事蹟。



教會是反科學和反進步的

當這些論調正盛行於中國內部時，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早已為祖國的現代化遠赴歐洲研究現代科技。留學的經歷讓他們看到了歐洲的社會激變，看到海外反教權、反教會的情緒，以及教會疏遠工人階級的事實。他們帶着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回到中國，宣傳天主教不但反中國，也與科學進步相衝突，指天主教落伍等等。

事實上，情形並非全然如此，因為那也正是教宗良十三世頒發「新事物」通諭的時期，當時，基督徒勞工運動亦正在起步；那也是傳教士在中國北方開創農業計劃的時候。然而，這些事實却被那些傳播局部真理的人所忽視。

教會不親中國

民族主義情緒與日俱長，腐敗的清朝被推翻，進而民國於一九一一年成立，各類代表大會和運動均呼籲中國人努力建立一個嶄新的和獨立的中國。然而，中國天主教徒却被棄置於社會主流之外，他們被視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合作者」。他們何時能除掉那不幸之歷史所加諸他們的「洋教」污名？

有些傳教士深覺這種可悲形勢，并試圖矯正它。然而大多數傳教士仍是「殖民時代的子女」，是來自法、德等殖民主義帝國的公民，未能跳出時代框框。國家給予傳教士的各種保護，亦使他們不能以開放態度去瞭解中國人的情緒。大部份傳教士未能以批判的眼光來研究當時情勢，體察問題，而對所受到的保護，却可能一直認為是天主的助佑。只有少數人意會到遠離殖民勢力是當前要

務。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很容易客觀地觀察出當時教會與某些殖民勢力聯繫過密，也看到此事實已傷害到傳教牧靈活動，阻延中國教會的自主成長。我們並無意譴責我們的前輩；他們是時代的兒女，無法跳出時代的局限。可是，我們應記取，承認過去的錯誤實是我們今天成長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我們應以真誠公正的態度面對殖民政策後遺症下的中國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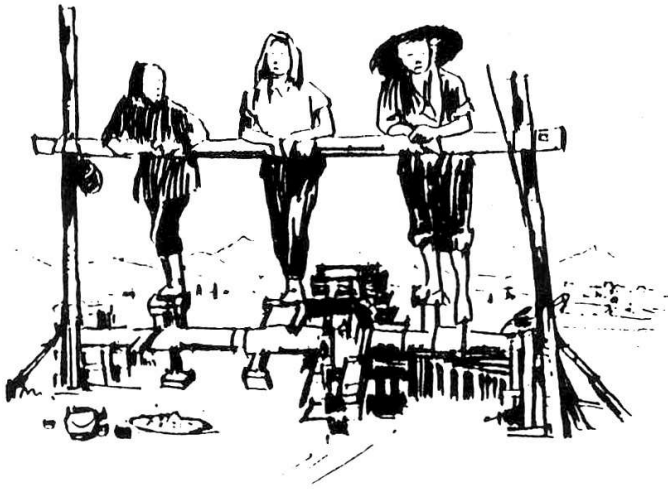
當時比利時雷鳴遠神父，公開支持中國天主教徒的民族情感，是他鼓勵司鐸與教友建立起中國聖統制的地方教會，使許多外國人感到驚愕。由於他的努力不懈，教宗庇護十一世最後在一九二六年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但為時已晚。當中國聖統制終於在一九四六年成立時，全國只有五分之一的教區有中國主教，可是幾乎所有牧靈傳教工作都是由外國傳教修會經管。

為解放後的教會留下包袱

任何有意瞭解今日中國教會的人，必須明白上述歷史，否則便無法瞭解共產黨解放後教會所經歷的事情。

共產黨員持有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對基督宗教有一貫的偏見。他們不難由歷史事實中尋找足夠的資料與藉口，控訴教會及其領袖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

在我所稱的「中國教會史的第六階段」中（即一九四九年至今），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切問題，都落在中國教會團體的肩上。這將成為教會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然而似乎從這一危機中，却誕了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中國教會。



(二)第六階段： 尋求本國的接納， 洗刷「洋教」的污名

雖然從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共產黨解放中國之日起，中國教會已歷經艱險，但現在似乎令人意外驚喜，她設法證實自己是一個地方教會，且比過去更顯得中國化。然而，她能否成為「真正的天主教地方教會」，仍有待證明。

中國地方教會已經歷五個時期的苦難與成長，才達到現在的境況。解放之初，教會與國家之間有過一段僵持不下的時期。繼而是一九五七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時期，即教會內部發生衝突的時期，然後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亦是教會所經歷的最大危機時期，而在這期間中，所有中國人，無論是信徒或非信徒，都遭受了苦難。繼後是一九七八年至今較為自由開放

的時期，這段時期顯示出中國教會正尋求在自己國家內被人民所接納，也設法擺脫「洋教」的歷史包袱。

解放初期（一九五〇至五七年）

自鴉片戰爭受辱以來，中國之需要現代化，更顯得刻不容緩。為實現這個目標，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不少中國科學家負笈歐美。然而最困難的抉擇是：中國政制要依循何種模式？是資本主義模式抑或是共產主義模式？兩種意見都有支持者：蔣介石（繼承孫逸仙）維護資本主義；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則維護第二個模式。長期內戰於是發生。一九四九年毛取得勝利，領導中國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他在天安門宣布：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影響與支配；為了自食其力地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應先根除任何外來影響或帝國主義遺毒。

這時期的教會被視為外國勢力，因為百分之八十的主教是外國人，外籍傳教修會幾乎經管着所有教會工作，天主教徒聽命於羅馬教宗。有些中國主教、神父和教友隨蔣介石的軍隊逃離中國，加重了教會與資本主義同夥的罪名。

這些都發生在四十年代末，即教會官方發出強烈反共言論的那些年份。例如，教宗庇護十一世的「預許救主」通諭宣稱共產主義「充滿錯誤與詭詐」、是「真正惡毒的宣傳」、「有組織的暴力」等等。

這種氣氛使中國天主教與無神論馬克思主義政府正面衝突，所有傳教士被視為外國間諜或工具而遭驅逐出境，大多教會財產，包括大學、中學、小學、育嬰院、醫院、診

所和農地，都被沒收。

教會爲了自衛，禁止教友與存心摧毀教會的政府合作。結果，這個策略又被政府視爲不愛國的明證。自此，中國教會開始陷入長期的危機。

中國天主教會這個小團體，要與無神論馬克斯主義政府繼續針鋒相對，抑或能找到緩衝之計？教會能破此僵局繼續生存嗎？無神論對於中國政府比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更重要嗎？假如現代化是最重要的挑戰，中國天主教友能否借此機會投身於這番事業，以證明他們與其他任何中國人一樣愛國，從而洗刷歷史悲劇所加諸他們的「洋教」污名呢？他們能否有機會表明，自己既是一個良好的、愛國的中國人，又是忠誠的教友呢？

在五十年代早期之僵局中就潛伏着這一個問題。現在我們由一九八六年回顧以往，描述歷史的發展，感到中國政府似乎花了一段頗長時間，才把現代化置於無神論之上。一九七九年，此一態度益趨明朗。一九八二年，新憲法實施，僵局才正式打開，它展示出一條通往前景的新道路。另一方面，天主教團體則擔心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合作，怕危及信仰。事實，自一九五七年與政府僵持的時期起，此一恐懼逐步導致了教會內部的衝突。

教會內部的衝突（一九五七至六六年）

一九五七年，共黨政府推行組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嘗試結集所有中國天主教徒參

與建設新中國的社會勞動，作爲推行統戰政策的一環。國家特別強調自治，要求所有天主教徒及天主教事務排除外國的控制與支配；教會要自治、自養、自傳。這法令，切斷與羅馬的所有連繫。

天主教友面臨進退兩難困境：如果忠於普世教會的精神領袖教宗，會受到政府蔑視；如果公開宣佈加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則會被其他天主教友視爲不忠於教宗。

做中國人與做天主教徒，本無矛盾，只因歷史加於他們身上的「洋教」污名，才造成如此左右爲難的處境。其實這二者都是他們的身份不可或缺的特質。

這個問題形成天主教團體內部產生悲痛的混亂。極少數中國天主教領袖選擇成爲愛國會會員，因而受他人排斥。大多數拒絕成爲會員的教徒，被迫轉入地下過他們的信仰生活。

隨着「百花齊放」運動出現的，是反右鬥爭，導致一些知識份子與一般老百姓長年接受「勞改」。就在這段時期，宗教事務局在各省各地方着手成立愛國會支部，同時大力推行「自選自聖主教」。

宗教事務局的宣傳引發了不少先前在外國主教手下，受過挫折和屈辱的中國神父的民族情感。

準備祝聖其新選主教前，宗教事務局所推薦的候選人請求羅馬同意，但羅馬拒絕，並警告說：任何獨立於羅馬之外的主教祝聖，將導致自動開除教籍。這警告激怒了一些神父與教友，他們譴責羅馬竟如此缺乏諒解。

當時羅馬與中國教會雙方都無法向對方說明自己的主張之實質，從而導致了這一齣歷史悲劇。當時的誤解至今仍被愛國會領導

作為理由，用來證明他們自行祝聖主教的決定是正當的。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六年間，有三十五位主教未經羅馬同意而自行祝聖。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這一決定引起羅馬的反應。雖然若望廿三世對此只用過三次「裂教」這個詞，以指出中國教會鋪下了不幸的「裂教之路」，但這已使中國教會感到失望，至今仍然否認發生分裂。

羅馬與中國之間的緊張，在普世教會造成這樣一個印象：在中國「忠貞教會」旁邊，存在着「多少有點分裂的愛國教會」。

我們當然知道愛國會會員與非會員間的關係是十分緊張的，有些地方且已公開發生爭議與分黨分派的事情，產生了可悲的形勢。可是，西方教會心中的「愛國教會」與「忠貞教會」的觀念和分裂情況並不存在。斷絕了與羅馬的交往是事實，但這種疏離却是過去某些聲明所造成的緊張而引起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至七六年）

目前無人能斷言文化大革命對物質、文化、道德、社會等各方面所造成的傷害，唯有留待歷史去漸漸揭露。雖然現在全國已投入四化的建設，但許多人仍須默默地從文革的創痛中復元。

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備受煎熬，很少家庭逃過此劫。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因為宗教信仰、洋教的陰影、以及與外國的關係，他們被控為顛覆份子。愛國會會員與非會員一同受苦，且受皮肉之苦。他們無助地目擊自己的教堂受到

破壞、搶劫；教堂充當戲院或工廠；任何宗教活動都被禁止；甚至家人都無法彼此信任，父母再也不能培育子女的宗教信仰。

那是全中國人一同受苦難的時期。一些歐洲人的宣傳文字中，却荒謬把它描繪為中國社會突飛猛進的時期。當一些歐洲人正以讚賞的眼光注視中國時，中國人民却經歷着有史以來最慘烈的苦痛。說到這個時期，一位中國教授曾有下列兩段有意思的評論：

「那時，所有中國人都無助地蜷曲於暴力與苦難之下。許多人開始經驗到人心最深的需要，因而開始反省生命、死亡、痛苦的真諦。這可能是目前很多中國人比從前較接近宗教信仰的一個原因。」

「這次劫難，不論如何，對基督徒來說



，有其救恩的意義。我們基督徒幾世紀以來始終被認為『不愛國』，又因為我們接受外國權勢的特殊保護而使其他中國人懷恨在心。可是現在，我們跟所有其他中國人受了同樣的苦，我們因此贏得了自稱『愛國的中國人』之權利。更重要的是，中國基督教會現在不再被人看成是外國教會了。」

這兩段評論堅定了我們的希望：由苦難深處，一個更真實的中國地方教會可能要誕生，起碼或多或少擺脫了「洋教」的污名。

無論如何，文化大革命對我們外國人仍是一片模糊。一位中國主教對他的外國友人說：「你們不在這裏，我們無法告訴你們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你們不要討論這事，更不要去判斷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八一年在馬尼拉對中國人所發表的講話，顯示出他已領悟到些許內情：

「在那長年累月中，你們無疑度過一些仍未為人所知的經歷，而且你們多次憑着良心，摸索什麼是應該做的：然而，我要你們知道：在這期間，並直到今日，我——普世教會與我——一直在思念和祈禱中與你們在一起……」這些話充份顯出基督徒的了解、欣賞和肯定的態度。

宗教自由政策的恢復落實 (一九七八至八二年)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自我開放，對外友好，促進交流。在向外開放方向發展中，

統戰政策再度得以積極推行，基督徒的力量亦再度被召入推動現代化的行列。天主教徒代表，甚至蒙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報》宣布，要落實宗教自由政策，基督徒不但可以內心相信，也應獲准在公開的教堂舉行宗教儀式。

同年，各省恢復宗教事務局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一些教堂重開放。

一九八〇年，政府要求國內五大宗教籌開全國大會。天主教開了兩個重要會議：第一個是五月末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第三屆全國大會；第二個在六月初，是首屆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會議中，決定組織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管理牧靈職務。從那時起，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被視為僅僅是教會與政府間的橋樑，是一個教友協會，掌理教會內的政治事務。

一九七九年的刑法規定，剝奪公民行使信仰權利的政府官員得予監禁。一九八二年公布的新憲法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回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天主教是中國五大宗教，各有經典、教規與教義，有別於迷信。假如這些宗教教導公民正確行為，可以在社會上起積極作用，理應受到尊重。

我們必須在中國走向開放，以及試圖集結所有人民共赴現代化的背景下，來看這新的宗教政策。這並不表示國家之宗教觀有何基本改變。這新政策只認為，使宗教消失是漫長的過程。中國承認一九五七年來未曾了解此一事實，因此犯下嚴禁宗教活動、風俗、習慣的錯誤。又特別宣佈：不得借助暴力去宣傳無神論。

現任北京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教授

，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曾作公開聲明，更顯示了社會上對宗教的態度已有轉變。他說：「宗教並不像以前所謂的是『人民的鴉片煙』，宗教毋寧是一項值得更深入研究的文化課題。宗教既不落伍，也不是一種逃避。相反的，宗教是面對世界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宗教絕不可被視為迷信。我們認為它是人類更深地反省生命意義的初步嘗試。」

趙復三在魯汶演講中，表達了他個人的觀點：宗教在中國當代有它自己的作用，就是在社會與文化領域、在人們之間能起和解的作用。這種看法，與五十年代的觀點及氣氛迥然相異。無可否認，中國在宗教領域上正有着重大的改變。

對官方的宗教自由政策，特別對新憲法第卅六條末句，天主教徒提出了一個問題：所謂「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支配」，這是不是針對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及針對普世教會的首席權？教宗的精神領導地位對一個像中國這樣只有很少教徒的國家，難道會意味着「外國支配」嗎？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重組教會（一九八二至八六年）

根據教會官員引用的數字，現在中國的天主教徒應略微超過三百萬（與一九四九年差不多一樣）。據說，包括嬰孩在內的領洗者，每年約共三萬。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約六百個教堂，一千多小堂已經重獲開放。

中國有大約五十位主教（其中數位乃由教宗庇護十二世指派）。許多教區仍無主教

，神父的確實數字不得而知，按估計約在兩千到三千之間，但平均年齡約七十上下。任何到中國的旅客，對他們的熱誠，他們牧靈工作及重建基督徒團體上的熱火，沒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

這些神父明白，中國教會的未來安危難以預料。他們中不少努力培養修女及傳道員，使他們將來能協助禮儀及牧民工作，他們以栽培年輕人追隨司鐸聖召為首要任務。雖然中國年青人改變甚多，聖召仍然很多。

目前教會重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重開大修院。一九八五年九月開辦的上海佘山修院，現今有修生九十五位，已在一九八五年祝聖了首批七位神父，且正在加建一座可容納一百六十位修生的新宿舍。北京全國性大修院亦已重開，而北京教區、武昌、瀋陽、成都、石家莊等地的大修院也相繼重開。全國共有六百多位大修士。

自一九八四年起，徐州、江蘇、吉林、漢口、北京、上海等地亦陸續開設修女初學院，目前共有一百四十多位初學修女接受培訓。

(三)中國天主教： 一個真正的地方教會？

天主行動與人自己的計劃和期望往往不同。整個普世教會已親見中國教會歷經危機，見到她在長期苦難中經歷了「嘗試與改正錯誤」的過程。一個教會能不能在經過三十年的混亂後首次在歷史中成為完全中國化的教會？她能不能具備所有地方教會應擁有的

自治、自養、自傳性質？同時，她能不能成爲在教宗領導下與普世教會信仰合一的真正天主教會？

當我們研究了各種現象之後，會迫不及待地說：「能夠」。這並不是一種徒然的希望，而是一個正在變成現實的希望。

我在中國大陸旅行時，拜訪各類教友團體，大有朝聖的感覺，像一次又一次地踏入信仰蓬勃的綠洲。大批群眾無論在平日還是主日，聚集在教堂。

一些地方在大瞻禮日，有成千教友老遠前往參與彌撒，很多人已經走了一整天，於前一天傍晚到達，爲的是不願錯過彌撒。他們由衷高唱拉丁彌撒曲，儀式莊嚴感人。成百的人前去告解。彌撒後有聖體降福。

在一些教友多的地方，參加每日清晨彌撒的教友也數以百計。你若在五月前往上海市郊的聖母朝聖地——佘山，你會碰到來自中國各地成千上萬的教友，虔誠誦唸玫瑰經並詠唱聖歌。

在某些重印的中文祈禱書裏，內有爲教宗祈禱的經文。很多人會告訴你，他們爲教宗祈禱，且感到自己與普世教會真正合一。

不管過去受過多少困苦，現在教友成群結隊上教堂。當你跟他們朝拜聖堂時，你可以察覺到內部衝突所遺留下的疤痕。這些創傷需要時間慢慢療癒。

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現已重印新約、師主篇、祈禱手冊、聖歌本及教理書（但是，教理書裏刪除了有關教宗首席權的問題）。過去六年間，也出刊了一種叫《中國天主教》的雜誌。在上海又有一新刊物問世，名叫《天主教研究資料匯編》。此外，他們也製造念珠、聖牌及其他宗教用品。北京還開設了相伯語言學校。其他地方，一些診所正在籌建，又有人談到籌組天主教語言文化研究所。

一方面，每個地方教會都該是自治、自養、自傳的，這是普世教會內一向的了解；另一方面，每個地方教會，只在教宗領導下



與普世教會共融，才是真正的天主教會。這兩方面同樣重要，都是教會存在的本質，互不矛盾抵觸。無論有什麼障礙，這種合一形式不能抹殺，因為這是天主教思想和生活的核心。許多訪問中國的人和我自己都相信，中國天主教友是忠實的，他們願在教宗領導下與普世教會信仰合一，團結共融。到中國的訪客，無論在接受上百次的握手中，或在與中國主教、神父、教友短暫的會晤中，都肯定了上述的答案，耳際不斷聽到下列簡潔的肯定：「我們的信念一如往昔。」「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我們都在同一個教會內。」

他們不可能多說，也無須多說。他們的聲明證實了始終未曾消失的信仰合一，也渴願表達此心態，即使只能以一種微小的形式來表達，也不會放棄機會。但願以後這些合一的願望能以更正式的方法表達出來。

結語：讓我們與中國教會 發展一種新型關係

昔日，中國與梵蒂岡及與許多國家的關係都不友好，彼此在許多聲明中都顯得強硬和不友善。但近年來，雙方的態度和聲明已逐步改善，顯得溫和、開放。當今教宗在馬尼拉更呼籲大家忘記過去，展望將來。

許多中國司鐸、會士、教友，在過去七年中有機會回家探親，漸漸發展出真正友誼的連繫。近年來，中國、亞洲、非洲與西方天主教友之間有了來往。開始很謹慎，只有幾個西方人士往訪中國，其中，有 K O E-

N I G 和 E T C H E G A R R A Y 樞機，也有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加拿大滿地可。不過，最近兩年，這類互訪已增加。菲律賓辛樞機會領導一個訪問團往訪。香港胡振中主教則兩度往訪。一九八五年另有五位亞洲主教訪問中國。

接着，中國主教們亦感到他們也準備好赴邀。上海輔理主教金魯賢，於一九八五年四月與七月相繼訪問了馬尼拉及香港。傅鐵山主教（北京）、涂世華主教（漢陽）、王學明主教（呼和浩特）、高飛林神父、劉柏年先生與崔永久先生，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接受魯汶大學校長之邀訪問了比利時。金魯賢主教於一九八六年春訪問了德國；秋天，他還會聯同若干中國主教訪問美國。

這些訪問有助推進中國教會與其他地方教會之間的友好關係。其他地方教會儘管深知仍有許多問題有待澄清與解決，仍向中國教會領導發出邀請，使以「愛德與真理」為基礎所發展的積極關係能向前邁進一步。

所有迹象都顯出，這些友好訪問將有增無減，而中國教會有愈來愈開放的趨向。我個人就經歷過這類接觸。

經金主教的邀請，我會為上海佘山修道院九十五位修士介紹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這是外國講者首次被邀這樣做。我坦率地以國語對着九十五位留心聆聽的修士，講述了梵二使教會跟上時代所作的努力。我說：「教會願意成為兄弟姐妹般的團體，為社會的科學進步盡心竭力，使社會達致進步與現代化。教會亦同時以一種蘊意深遠並適合時代的信仰生活，以證實精神的價值。」

我也告訴他們，梵二如何成為教會史上第一個富有多元特色的大公會議：來自各國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主教都列席參加，并

不存在美國或歐洲的統治。教會的未來方向，都是在衆志一心的團體精神下決定的。「多可惜！」我不禁補充說：「因為歷史緣由，中國大陸的主教未能參加此一歷史盛事！」我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些主教能在教宗首席權的領導下，與普世教會共融，在全球主教團中取得合法地位。

像在佘山這樣的溝通，正顯示出時代變了，一個新紀元正召喚中國教會在教會大家庭中復位。這是中國教會史上的轉捩點，也是普世教會史上新的一章。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教會正處於十字路口，對內不會再回到過去的歷史軌跡，對外不會再只被視為「傳教區」；它是正在成長的中國地方教會。在此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對此充份了解，努力建立彼此間的正確關係。

也是這個動機促使魯汶校長邀請中國主教訪比利時。他在告別辭裏，當着中國大使館人士面前，公開表達了他的希望：

「在歡迎辭中，我提到歷史上貴國與敵國，以及我們兩地教會的關係，我談到柏應理與南懷仁等前往中國的著名傳教士，他們促進了文化與科學的交流；他們主動傳佈福音的精神，在當時可說相當積極和直接。今天，時代已經改變，國家與人民皆已成長，天主教會與組織

與時俱進，而國際關係亦與過去極為不同。

過去的國家、教會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從東到西，從北到南，都離不開從屬、利益或控制的色彩，今日則強調互敬與手足之情。我們未來的關係亦必須有同樣的特質。」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傳教工作已經結束，這是實事。中國的教會的成熟與自導前程的能力也是可以肯定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必須忘記中國或她的需要。相反地，情勢的轉變帶來新的挑戰，因此，我們而努力尋出與此地方教會連繫的新途徑。

四十年前，當整個世界處於殖民時代，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許會被當時的思潮所污染。今天，必須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必須透過漸進的努力方能達成。我們所有處身海外的人，必須與中國一起再認識彼此的人民與文化，學會互相尊重與欣賞。我們必須找出彼此交換與學習的特性。這樣，科學、文化與宗教，都能成爲互惠的材料。這樣，中國與西方教會才能一起越過現代史所發生過的錯誤，從事有意義的文化與科學的交流，并基於互相尊重與平等的原則，發展互惠關係與兄弟情誼。